

费正清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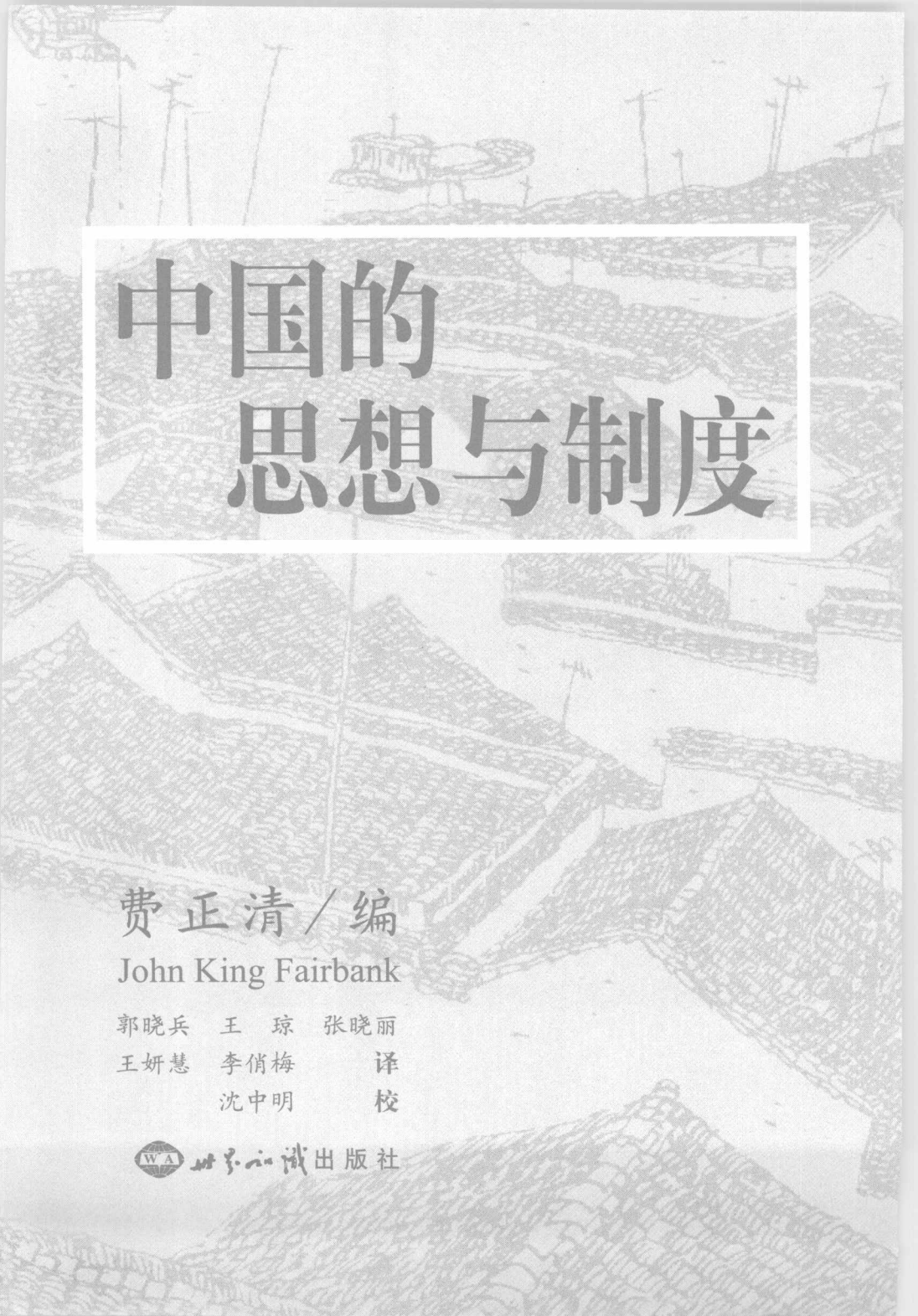
思想与
中国的
制度

Chinese
Thought &
Institutions

John King Fairbank (美) 费正清 编

郭晓兵 主译 张盛刚 王妍慧 李俏梅 译

沈中明 校



中国的 思想与制度

费正清 / 编

John King Fairbank

郭晓兵 王 琮 张晓丽

王妍慧 李俏梅 译

沈中明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Copyright © 1957 by Robert Redfiel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2002-37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 / (美) 费正清编; 郭晓兵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1

(费正清文集)

ISBN 978-7-5012-3208-6

I. 中… II. ①费… ②郭… III. 历史—研究—中国 IV. 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7138号

策划编辑
责任编辑
文字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王立 张光勤
姜志达 侯奕萌
沈中明 阮中强 胡孝文
林琦 刘喆
张琨

书 名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

Zhongguo de Sixiang Yu Zhidu

编 者
译 者
校 订

[美]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郭晓兵 王 琼 张晓丽 王妍慧 李俏梅
沈中明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电 话
网 址
印 刷
经 销
开本印张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010-65265919 (直销) 010-65265928 (发行)
www.wap1934.com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新华书店
880×1230毫米 1/32 17印张 230千字 116幅图
2008年1月第一版 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3208-6

定 价

ISBN 0-226-23403-7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佳 评 如 潮

本书研究的不仅仅是中国哲学，也不仅仅是中国思想所表述的众多观点的一个分支，而是关注“中国思想、政治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思想的发展”。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对于几代学者和一般公众来说，若想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并有洞见，一定要读费正清的著作。

哈佛大学出版社

费正清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经历和交际的广度，使他在重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处于圣贤和使者双重角色的地位。

保罗·埃文斯

在哈佛的中国研究领域，费正清是伟大的奠基者和机构缔造者……如果没有一位自信的不懈的斗士，开垦拓荒并创建我们的东亚王朝，我们无法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

傅高义

今天哈佛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就是从费正清创设中国学研究开始，并成为相应的衡量指标。

史华慈

回眸中美关系史，有一位矗立于美国汉学界巅峰几十年而不衰的泰斗不能遗忘，他就是从1929年起就把全部精力奉献给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以及中西关系的学者费正清。在某种程度上，费正清这三个字就意味着美国的汉学研究。

傅光明

出版前言

《中国音乐史》一书，是音乐史学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对于我国音乐史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本书的作者，是音乐史学领域的权威专家，他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泛的国际视野。本书的出版，不仅为音乐史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本书的出版，是音乐史学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音乐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和专家的肯定和好评。本书的出版，是音乐史学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音乐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和专家的肯定和好评。本书的出版，是音乐史学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音乐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和专家的肯定和好评。

世界出版集团

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和影响。

出版此套《费正清文集》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冷静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意义。由于费正清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看待中国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前 言

(Foreword)

罗 伯 特 · 雷 德 菲 尔 德

(Robert Redfield)

米 尔 顿 · B. 辛 格

(Milton B. Singer)

自1951年起，负责这一系列丛书的两编辑利用福特基金会的拨款，致力于促进和发展文化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些伟大文明的研究，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对这些文明进行相互比较。这项研究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鼓励以可行性方法进行跨文化研究；对学者们提出或使用的方法加以评判和检验；为进一步做研究的专家提供帮助，因为他们较少运用纵向比较差异的方法，多采用横向联系的方法，并和其他文明进行更为可靠的比较研究。

现在，远东协会中国思想委员会里有这样的一群专家着实让我们欣喜。他们属于（现在定名为）远东协会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组织。这些专家自行结成研究小组，精力充沛、富有活力。他们的工作引导我们向更加全面、更加宏观、包罗万象的目标上前进。这一群中国文明方面的专家是一个协同合作的团体，他们有着相似的兴趣，承担着同等的义务，乐于交流想法和研究成果，工作起来一丝不苟、雷厉风行。现在，他们还会继续这种智慧上的高效合作，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研究的主题有着积极进取的精神，能够让人们看到这种研究会带来的积极乐观的成果！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哲学，不仅仅是中国思想所表述的

众多观点的一个分支，而是关注“中国思想”——“政治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思想的发展”。他们认为“思想”就是想法，同样也是习俗和行为，是要同时研究的，而且他们也乐于为此共同努力。几年间，专家们不断进行着相互批评和相互帮助的学术交流活动。此外，他们还孜孜不倦地向社会学家们请教。他们的请教不是为了得出某个结论或总结某个教条，而是为了寻求建议和激励，引导他们作为专家和学者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比较研究的路上不断前进——这种可比性研究目前虽然还尚未完成，但是我们相信相关结论将来一定能够显现。因此，这些人通过研究活动成为专家，并和诸如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以及比较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之间建立了重要联系。因为他们了解格兰内特（Granet）和韦伯（Weber）关于中国和中国官僚的著作，所以他们既不会全盘接受也不会断然蔑视这些著作。学者们会忠实于自己的专业并认真地细心观察，同时又倾听别人的意见并改正早先武断的结论。

有人曾资助过一笔钱用来进行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工作。最初，人们关于如何花费这笔经费的决定使得1952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本（Aspen）召开关于“中国思想”委员会会议成为可能。那次会议的一个最终成果是出版了这套系列丛书的第一本著作：《中国思想研究》。这本书由芮沃寿（Arthur F. Wright）于1953年编辑成册。书中澄清了许多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一些汉学家一直激烈讨论和抨击的对象，因为他们借此希望自己的研究结果会给中国文明的课题带来全面的理解，同时又能更好地将

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中国思想研究》是一部具有探索性质的著作，其中倡导了多条研究思路。而现在这一册（总编辑所负责丛书中的第八册）书中讨论的话题则更为集中，目标更趋一致。其次，“中国思想”委员会会议的第二项任务是将研究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不同的思想上，尤其是与儒家思想的相互关系上；集中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各个大事上，其中的焦点是儒学的状况。从费正清教授出色的引言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话题在十三位专家笔下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些人论述了思想与行为和国家权力运用之间的关系；一些人将儒家学说以及其他重要思想同士大夫相联系——而正是这样的联系使个人同事业与思想以及制度的关系维持了长达两千年之久。委员会主动参与到赫伯特·戈德哈默博士（Dr. Herbert Goldhamer）的工作中，因为他正是从事此项任务最合适的社会学家人选。他博览群书，善于批判，目光敏锐。

总编对于委员会第二版——一部全面改进的著作以及对戈德哈默博士的帮助深表感谢。我们还要感谢赫曼·西奈科（Herman Sinaiko）先生，他将娴熟的中文技能和汉学知识充分发挥，为本书的付梓交印和准备手稿做出了巨大贡献。

（郭晓兵 译）

引言：方法和内容

(Introduction: Problems of Method
and of Content)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 [1] 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一个被人们长久忽略的领域，要想对此深入研究，不妨注意下面这些文章。这些文章与其说更多涉及的是古代经典文献的形成，不如说是介绍儒家思想在政治斗争和社会政治制度中的运用。颇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研究都是出自历史学家而非政治学家之手，当然其中也含有社会学家的帮助。虽然政治学家在其专业角度尚不至于消亡，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在极力规避中国政治记载所带来的挑战，而且做得还相当不错。这些历史记载不仅在我们的图书馆里唾手可得，而且它们毕竟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政府制度持续最为悠久的一段经历。

我认为，西方政治学中的狭隘主义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其根源来自一个所谓普遍科学性的错误理论，即对待“区域”的特殊化持否定态度。这些政治学家是在西方政治生活的背景下接受数据、观念和语言等方面的训练，他们把已有知识进行逻辑性而非地域性的分类。因此，他们不会去研究全人类中大多数人的政治，而这大多数人却恰恰居住在亚洲。在经济学领域，落后地区发展的迫切需要促使美国经济学家于不久前创造了新的发展学说。这一学说恰巧也主要适用于亚洲，而且不受地方主义的限制。毫无疑问，出于政府管理的需求，将来政治学领域也会出现相似的可喜进展。

与此同时，作为从事专门研究某一地区的历史学家，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感到自己正处于既令人兴奋又常令人迷惑的跨文化边界。在这个领域里，社会科学的分析能力同人文学者特有的专业知识同样重要。我们必须坚持采用两种方法，兼容并举。为了透彻分析保存完好、深奥难懂的中国历史文学内涵，我们需要汉学家的严谨态度和极大耐心。同时，为了搞清中国政治现象所蕴涵的深意，使之对现代科学的研究有所帮助，我们又必须研究后者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学领域的知识。

毫无疑问，现代学者们普遍面临这样的处境：一方面，[2]他们在尝试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能跟上其他领域的迅速发展。因此，我们在中国传统思想上所获得的经验不仅能吸引不断增长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且更能吸引广泛的读者群。以下我们主要概述一下我们工作的起源、研究方法和内容。

一、原因和方法

中国思想委员会——即现在的远东协会于1951年成立。当时大家普遍认为，西方的学者们长久以来忽视了一些中国传统观点在其社会及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结果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我们已翻译并研究了相当数量的经典文献和历史著作，但却很少注意到这些传统观点与中国政治制度及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很少关注与这些观点有针对性的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和其间政策的影响以及对此进行相关分析。随着战后美国国内对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的升温，人们似乎有可能调集多种多样的思维方法和

技术手段，寻找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情况下备受忽略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将他们的工作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新观点的提出成为可能。这项工作是在美国学术理事会的莫蒂默·格雷夫思（Mortimer Graves）的提议下发起的。斯坦福大学的芮沃寿（Arthur F. Wright）成为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在罗伯特·雷德费尔德（Robert Redfield）主持的“文化与文明比较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第一届关于中国思想的研究会议于1952年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Aspen）举行。

会议之后，芮沃寿出版了论文集（《中国思想研究》，美国人类学协会，学术论文第75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在前言中，他指出这次会议为系统分析和研究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些新的道路包括：研究诸子百家的思想渊源；界定关键术语；描述、评价一些观点发展的历程；讨论价值观念的沿革；记述学术取向的变迁；分析外来观点在中国的发展；研究非语言符号意义的发展过程。正是有了这次会议的经验，再加上会议成果受到热诚的接纳，在这样的鼓舞下，中国思想委员会才得以于1954年9月3日至10日在新罕布什尔州拉哥尼亚（Laconia）附近的斯蒂尔山（Steele Hill）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第二次大会。会议的主题为“中国传统观念与制度习俗之间的关系”。

从若干论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二次讨论会的价值。

- [3] 首先，所有的论文都是事先发给大家，让每个人预先看一下，然后对每一篇论文的讨论也是由一名与会成员对论文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然后再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每天都有位能干的报告起草人（由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斯蒂芬·海依[Stephen Hay]先生担当）准备纪要（而不是逐字记录）。接

下来，论文的修订工作便可以从容不迫地利用学者们在几个小时中对每个主题及相关方面进行批判性评论的成果。正是采用了这些方法，才使得这一周讨论会上的十三名讨论者不但拥有条理清晰的思维，而且富有自由发挥的灵感——二者达到了平衡的默契。（让人尤为印象深刻的是，几年来的调查成果和多位同事的集体智慧兼容并蓄，一位学者一年的研究就把许多人好几年的研究成果甚至许多人倾尽一生所得的智慧汇聚到了一起。）

就方法论而言，我们向与会者提供了汉学研究以外社会学家们颇有见地的批评。我们认为，尽管想方设法，耗费重重努力，催发不同学科的结合，真正的知识组成仍然而且一定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之中。要想更为有效地研究中国，那么汉学家的脑海中必定要出现跨学科的新设想。为了得到更为重要、更加集中的信息，而不是刻意关注不同学科的对立和冲突，我们于是只邀请了一位汉学家，即兰德公司（Rand Corp.）的赫伯特·戈德哈默（Herbert Goldhamer）博士作为与会者的咨询顾问。随即在1954年初，学者们开展了各项课题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会者都会就研究课题的主要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及时向戈德哈默博士请教，并从这位顾问提出的意见中受益匪浅。不管在会议召开之前，还是在会议过程之中，大家一直如此。

就这些论文所涉及的方面而言，我认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下半期西方历史研究多样化的特点。每位作者都自主选择了论题并进行了研究。然而结果却是，这些论文并非与总体规划完全吻合。最好的情况不过是论文和我们的计划有一半是符合的，有一半是有联系的。但毫无疑问，这些论文的撰写者在两个方面的观点相当一致，即大家都认为思想在历史

进程中具有的主要作用。同样，在研究中国历史中思想和习俗的关系时，大家都遇到的一些特别的问题。

首先我们认为，学者们所研究的各种思想在中文著作当中都有记录，都可以查询得到，而且这些思想在中国人的头脑中都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中国许多重大事件中都曾是十分重要的部分。思想是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是整体当中的个体。我们每个人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话语给思想在思想家一系列的行为以及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下一个抽象的定义。但我们相信，对于历史的理解，不论是在其独有的特殊性还是在其潜在的普遍性上，都不仅仅是研究一些抽象的名称、因素和定义。我们基本赞同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先生的观点。正如他在本卷开篇时所说的那样：在最终的分析中，我们必须通过个人提出观点时牵连的内在含义、态度和感受，以及这种思想与特定时间、人物、地点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去理解它。仅仅按照促使其产生的各种原因去为其发展寻找解释或仅局限于对某人思想的错误之处进行批判是不够的。历史学家必须试图去了解每位思想家的内心世界及他的思想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要承认这位思想家对当时情况的反应中包括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发挥和个人创造。这意味着，在这个所知史料相对极少的汉学研究领域里，我们必须从一种文化史实研究出发，并与悉心分析和缜密阐述紧密结合，同时还要考虑到普遍意义上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应用。我们面临的首要危险是，为了仿效人们对西方思想历史的深入研究，我们会急于使自己的研究达到一种概括而抽象的水平。

第二，我们尝试着对中国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意义进行理解，这要求我们必须把自己看作是观察者。但是，文化